

# 西汉诸侯王墓敛葬玉衣及相关问题

刘尊志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天津 300071)

**Abstract:** In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vassal after death would be buried with jade burial suit, which reflected the burial idea of protection of dead body and seeking eternal life and becoming fairy. Generally researching, the jade burial suits of Western Han Dynasty vassals had characteristic of improvement, and became perfect day by day. Using jade burial suit in Western Han Dynasty had a rigid rule that the vassal of different clan and the vassal of same clan but rebellion could commonly not use jade burial suit. It was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opinions that the hierarchy of using jade burial suit had gradually established. When the vassal used the jade burial suit, other jades would be used, but basically, the jade burial suit were important, other burial jade were less important.

**Key words:**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tomb of vassal; jade burial suit; burial

**摘要:** 西汉诸侯王死后使用玉衣敛葬是其身份地位的体现,也反映出保护尸身,以求不朽和追求升仙的丧葬思想。综合考察,西汉诸侯王墓的敛葬玉衣具有继承和发展特点,并日趋完善。西汉诸侯王墓使用敛葬玉衣具有相对严格的制度,异姓诸侯王及谋反的同姓王一般不用玉衣敛葬,而使用者的分级制度也在西汉中期逐渐确立,这与以往的认识有所不同。与敛葬玉衣相配套,西汉诸侯王墓还使用其他一些敛葬用玉,但基本是以玉衣为主,其他为辅的使用原则。

**关键词:** 西汉; 诸侯墓; 玉衣; 敛葬

西汉诸侯王墓除有大规模的墓葬,数量众多的陪葬品和高规格的葬具外,对于墓主尸身所用的敛葬用品也极为重视。关于汉代及之前死者所用的敛葬用品,史书中多有记述,杨树达和韩国河等先生也分别以汉代为例对此展开过深入探讨<sup>①</sup>。玉衣作为敛葬用品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很多方面体现了汉代高层统治者的敛葬制度和丧葬思想。关于西汉诸侯王墓的敛葬玉衣,卢兆荫、石荣传、罗波等先生对其起源、制作工艺、艺术风格、相关制度及所体现的丧葬思想等均有较深入的论述和分析<sup>②</sup>,为我们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考古资料为基础,结合文献记载,对西汉诸侯王墓敛葬玉衣及相关问题作简单论述,不正之处,以求指正。

## 一、西汉诸侯王墓出土敛葬玉衣概况

史书中关于西汉皇帝、皇后死后敛葬玉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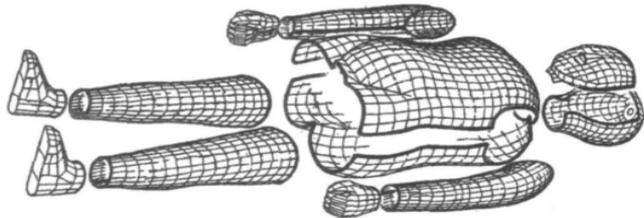
记载较多,也比较详细<sup>③</sup>。比较而言,关于诸侯王的敛葬玉衣,史书记载并不多,如《汉旧仪》载“王侯葬,腰以下玉为札,长尺,广二寸半,为匣,下至足,缀以黄金缕为之”等。比较而言,西汉诸侯王墓敛葬玉衣的考古资料较多,这为我们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根据已公布的考古资料,截至目前,已发现、发掘西汉诸侯王(后)墓达70余座。其中出土敛葬玉衣的墓葬主要有河北满城M1(图一)、M2<sup>④</sup>、定县M40<sup>⑤</sup>、鹿泉市北新城汉墓M2<sup>⑥</sup>、河南永城保安山M2、柿园汉墓、夫子山M1、黄土山M1与M2、僖山M1与M2、窰山M1与M2<sup>⑦</sup>、长沙风篷岭汉墓<sup>⑧</sup>、江苏徐州狮子山汉墓<sup>⑨</sup>(图二)、北洞山汉墓<sup>⑩</sup>、东洞山M1<sup>⑪</sup>、高邮天山M2<sup>⑫</sup>、北京大葆台M1与M2<sup>⑬</sup>、山东曲阜九龙山M3<sup>⑭</sup>、安徽双墩M1<sup>⑮</sup>、广州南越王墓<sup>⑯</sup>等。满城M1与M2、广州南越王墓等墓葬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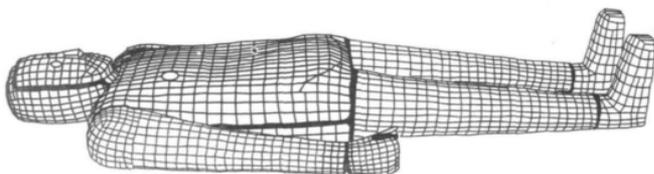
为完整，玉衣保存较好，满城 M1、M2 出土的为金缕玉衣，南越王墓出土的则为丝缕玉衣。狮子山汉墓、定县 M40 等虽遭盗扰，但玉衣片多数保留，能够复原出较为完整的金缕玉衣。狮子山汉墓出土玉衣是目前考古发现时代最早较为完备的金缕玉衣，从其形制等分析，西汉早期略早阶段，金缕玉衣的形制已较完备。其他墓葬由于盗扰相对严重，敛葬玉衣多难复原，出土玉衣片的数量也是多寡不一，有的仅有几片，有的则有数百片之多。部分缕质清晰，为金缕，部分则不详，如鹿泉北新城 M2。少数墓葬的玉衣片较为特殊，如北洞山汉墓出土有大量鳞甲形玉衣片（图三），而大葆台 M2 出土玉片未有穿孔等。综合来看，西汉早、中、晚期的诸侯王墓均有玉衣出土，而且王及王后墓均有发现。

已发现、发掘的西汉诸侯王墓中，有些墓葬只发掘了陪葬坑或仅作相关调查，是否使用玉衣还不清楚，如章丘洛庄汉墓<sup>17</sup>、危山汉墓<sup>18</sup>、青州香山汉墓<sup>19</sup>、临淄齐王墓<sup>20</sup>等。有些墓葬被盗一空，如徐州南洞山 M1、M2<sup>21</sup>等，是否有玉衣敛葬已不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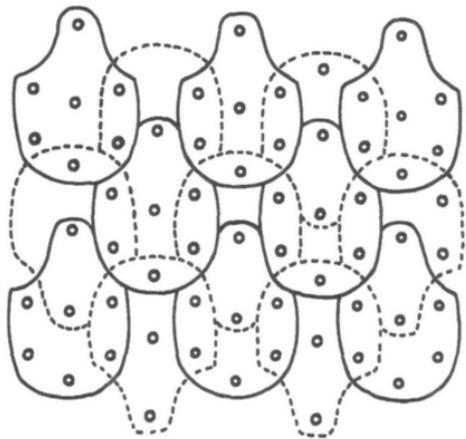
另外还有些墓葬虽遭盗扰程度不一，但均无玉衣发现。主要墓葬有河北献县 M36<sup>22</sup>、石家庄小沿村汉墓<sup>23</sup>、获鹿高庄 M1<sup>24</sup>，北京老山汉墓<sup>25</sup>，山东长清双乳山 M1<sup>26</sup>、昌乐东圈 M1<sup>27</sup>、巨野红土山汉墓<sup>28</sup>，长沙象鼻嘴 M1<sup>29</sup>、陡壁山 M1<sup>30</sup>、望城坡汉墓<sup>31</sup>，江苏徐州驮篮山 M1、M2<sup>32</sup>、小龟山楚王及王后墓<sup>33</sup>、东洞山 M2<sup>34</sup>、卧牛山汉墓<sup>35</sup>、泗阳大青墩汉墓<sup>36</sup>、高邮天山 M1<sup>37</sup>等。这些墓葬中，部分原可能有玉衣敛葬，但经盗扰已不存；



图一 河北满城 M1 出土玉衣



图二 江苏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玉衣



图三 江苏徐州北洞山汉墓出土鳞甲形玉衣片  
有些墓葬原来可能就无玉衣敛葬，如东洞山 M2，古代未遭盗掘，但相关遗物中并无玉衣发现。

## 二、关于西汉诸侯王墓敛葬玉衣的几点认识

西汉诸侯王墓发现数量多，分布地域广，但有的墓葬有玉衣发现，有的则无，而出土玉衣的缕质等也有差异，体现出不同的内容和内涵。在考古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记载，笔者仅就西汉诸侯王墓敛葬玉衣谈以下几点认识。

（一）从文献记载结合考古资料看，西汉诸侯王下葬时，贴身衣服之外的敛服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以衣衾裹尸，由于保护环境较差，这些纺织品大多不存，本文亦不多作讨论；另一种就是玉衣，发现相对较多。当然，也存在墓主赤身套穿玉衣的情形，南越王墓即表现得较为明显。而根据《汉旧仪》记载，诸侯王所着玉敛服为腰以下部分，至上部，无上衣，以金缕穿缀，称为金缕玉匣。但从考古资料看，不仅上身有衣，头部亦用玉片包裹，基本用金线穿缀，是全面保护尸体的敛服。因此，西汉诸侯王死后并未严格按照《汉旧仪》所载的玉衣制度执行，其中有无玉衣敛葬者，而有玉衣敛葬者基本都是全身着玉衣，但金缕方面与记载基本一致。

（二）由于被盗严重，一些墓葬内几乎无陪葬品或仅余空墓坑，加上一些墓葬只发掘了陪葬坑或陪葬墓，有的仅作调查，墓内有无玉衣敛葬还很难确定。然而，还有一些盗扰不是十分严重的墓葬内无玉衣发现，这当有一定的原因或制度存在。

相关墓葬中，石家庄小沿村汉墓、长沙

相关墓葬中，石家庄小沿村汉墓、长沙

象鼻嘴 M1、望城坡汉墓、陡壁山 M1 等为异姓诸侯王墓，出土遗物相对较多，但无玉衣发现，说明西汉时期异姓诸侯王可能不享有玉衣敛葬的权利。就长沙地区发现的西汉诸侯王墓来看，上述 3 座墓葬的墓主为吴姓长沙王或王后，时代在西汉前期，而作为刘姓长沙王后墓的风篷岭 M1 的年代为西汉晚期<sup>⑧</sup>，但该墓却有玉衣发现。西汉前期，诸侯王墓使用敛葬玉衣已较普遍，西汉晚期，玉衣的使用受封建王朝及诸侯国发展等因素的制约衰落态势明显，两相对比，更加证明西汉异姓诸侯王及王后死后不能用玉衣敛葬的制度很有可能是存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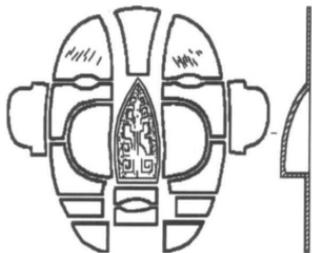
同姓诸侯王墓中，徐州驮篮山汉墓可能为第三代刘姓楚王刘戊及其夫人的异穴合葬墓<sup>⑨</sup>，长清双乳山 M1 可能为济北王刘宽之墓<sup>⑩</sup>，高邮天山 M1 可能为广陵王刘胥的墓葬<sup>⑪</sup>。三处墓葬的墓主都是参与或直接谋反的刘姓诸侯王，失败后被诛或自杀。谋反的诸侯王能够葬在生前修造的墓葬中，并有相应的物品用来陪葬，应是中央政府对同姓子弟的怜悯与例外开恩，但在很多方面特别是礼制上又会有较为严格的限制，不能用玉衣敛葬应是制度之一。不过，王后若较谋反诸侯王先死，使用敛葬玉衣则属正常。如广陵王刘胥在位达 60 余年，其王后可能较其先死，而王后墓（M2）内即发现有敛葬玉衣。

就西汉异姓诸侯王和谋反的同姓诸侯王来讲，有不用玉衣敛葬的制度存在，但也有部分诸侯王墓存在特殊情况或可使用相关替代品。广州象岗南越王墓为异姓诸侯王墓，墓内出土有丝缕玉衣，明显不同于其他异姓王墓，体现出其特殊性，这与南越国地处边陲，汉政府有特殊政策，从而形成较为特殊的诸侯国地位等有关。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说明南越王死后的敛服可与其他异姓王不同，即可以使用玉衣。但考察西汉诸侯王墓出土玉衣，多数为金缕穿缀，丝缕玉衣与之有着明显差别，表明南越王虽地位特殊但仍不能达到同姓王的标准，这也进一步说明西汉时期异姓王不能用玉衣敛葬的制度应是存在的。而结合上文，丝缕玉衣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被视作金缕玉衣的替代品。关于谋反诸侯王，按汉制，其中一些死后被降格为侯或更低等级再进行安葬，但与侯一级相匹配的银缕玉衣或更低等级的铜缕玉衣亦未在这些墓葬中发现，说明任何缕质的敛葬玉衣对谋反者来讲都是被禁止使用的，

相应的制度更为严格。但在一些相关墓葬中，也会有一般刘姓贵族使用的等级较低的敛葬玉器发现，形成相应的替代品。如长清双乳山 M1，墓主为谋反王刘宽，墓内无玉衣，其他玉器亦较少，但出土有玉面罩，这可能是降格后的替代品。面罩出土时仍覆于墓主面上，组合、形状、结构、大小等情况较为清晰，由额、颧、腮、颈、颌、颊、耳 17 块玉片和鼻罩组合而成，各玉片内侧下棱和鼻罩边缘处斜穿细微孔，孔孔对应，以便相互缀连，因未发现金属丝，连线似为丝缕之类（图四）。

刨除异姓王和谋反的同姓诸侯王，还有一些正常死亡的同姓诸侯王或王后无玉衣或相关遗迹、遗物发现，说明西汉一代虽有关于玉衣敛葬的制度和相关规定，但使不使用玉衣敛葬和诸侯国的国力，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墓葬的时代及葬制、葬俗的地域性特点等也有较大关系。换言之，西汉一代并没有诸侯王或王后死后必须使用玉衣作为敛服的硬性规定。

（三）出土敛葬玉衣的西汉诸侯王墓时代基本贯穿整个西汉时期，因此使用玉衣敛葬应是西汉诸侯王丧葬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所知同姓诸侯王墓的最早时代为文帝初年，而这一时期的诸侯王墓中即发现有较为完整的金缕玉衣，如徐州狮子山汉墓等，异姓王墓如石家庄小沿村张耳墓却没有玉衣发现。说明早在西汉早期偏早阶段就已有相关玉衣敛葬的制度，即同姓王可用金缕玉衣敛葬，而异姓王基本无玉衣敛葬。因其是一项制度，而且针对诸侯王使用，故在出现之初就较为严格。西汉早期，时代较早且正常死亡的同姓诸侯王如齐王刘肥、燕王刘泽、燕灵王刘建、荆王刘贾等，除荆王刘贾较高祖刘邦先死外，其余均晚于刘邦，他们的墓葬暂时还未发现，是否有玉衣敛葬还不清楚。但与他们去世年代接近的狮子山汉墓内发现有完整金缕玉衣，且



图四 山东长清双乳山 M1 出土玉面罩

该墓的年代距离刘邦去世仅 20 年左右。汉高祖刘邦死于公元前 195 年，其死后可能会有金缕玉衣敛葬，而这正是诸侯王敛服的最佳参考，也就是说同姓诸侯王用来敛葬的金缕玉衣可能是受到皇帝敛服制度的影响，而这也是其形制在西汉早期略早阶段已较为完善的原因之一。

(四) 就目前资料，已知的西汉早期非谋反同姓诸侯王的墓葬内有一定数量的金缕玉衣发现，如徐州狮子山、北洞山楚王墓，河南永城保安山 M2、柿园汉墓等，可见在西汉早期，诸侯王死后用金缕玉衣敛葬已较流行。但西汉早期王后死后用玉衣敛葬的现象并不普遍，一些王后墓如献县 M36 等并无玉衣发现。而结合上文所述，西汉时期，诸侯王在死后可否使用玉衣敛葬，使用何种缕质的玉衣等都可能有一定的制度存在，这在西汉早期就已形成。但分级制度，即诸侯王与等级稍低者之间玉衣使用制度的差别在这一时期并未完全成熟，还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永城保安山 M3 的墓主为梁王的妾或夫人，使用了金缕玉衣敛葬，山东临沂洪家店汉墓墓主刘疵为皇室后裔或列侯，墓内出土有金缕玉套<sup>⑫</sup>等也都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可以说，西汉早期关于敛葬玉衣的使用制度虽已确立，且在某此方面相对严格，但仍处于初期阶段，还有一些需完善之处。

考古发现的西汉中后期诸侯王及王后墓内，敛葬玉衣出土相对较多，而且基本是金缕玉衣，如河北满城 M1、M2 等。因此可以说，进入西汉中期后，诸侯王及王后死后用玉衣敛葬更为流行，而与之同步的是，金缕玉衣敛葬制度得到更进一步的完善。需要指出的是，西汉中后期，一些列侯或等级更低者死后还可使用金缕穿缀的玉敛服，但它们并不是金缕玉衣。河北邢台南郊南曲炆侯刘迁墓在发掘前被盗扰，初发现时死者浑身上下都有玉片，但实际报道仅 200 余片。简报称刘炆死后使用了金缕玉衣，但与其等级不相称，并认为可能是西汉的玉衣制度还不严，也可能是一种“逾制”，而这种情况是常有的<sup>⑬</sup>。笔者认为，该墓出土玉片虽分布于死者尸身上下，但并不一定是玉衣，一方面玉片数量较少，另一方面，头、脚等部位未见相关描述，其作为玉套更为合适。山东五莲张家仲崮东昌侯刘祖墓出土的玉片不足以编成全套玉衣，而墓主刘祖被免，死时不是列侯，且墓葬为小型墓葬，规格不高，因此未必能用玉衣敛葬，考虑到绝大多数玉片出

土于头部，存在为玉面罩的可能性很大<sup>⑭</sup>。因此，参考已有的考古资料，就西汉中后期诸侯王及王后以下级别的人员来讲，是基本不用玉衣敛葬的，更不会使用金缕玉衣，但可用金缕穿缀的其他敛葬品，如面罩、套等。这正是等级差别的体现，说明西汉中后期敛葬玉衣的制度得到进一步健全，分级也相对明确，即帝、王及其后用金缕玉衣敛葬，身份地位低于诸侯王及王后的相应等级可用银缕、铜缕或其他缕质的玉衣，也可用金缕穿缀的面罩、套等，体现出丧葬等级制度日益健全和越来越严格的特点，但其中也有一些不完善之处，如金缕面罩或套的使用等。以上结论与卢兆荫先生所言“在西汉时期，玉衣分级使用的制度尚未确立”<sup>⑮</sup>的观点可能存在一些不同之处。东汉时期，诸侯王的权力地位大大削弱，敛葬玉衣制度在西汉发展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考古资料证明，这一时期诸侯王和王后死后用银缕或铜缕玉衣敛葬，与帝后使用金缕玉衣形成鲜明的等级差别，帝、王在玉衣使用上分级更趋于明显，但诸侯王敛葬玉衣的缕质却呈现出多样性，体现出一个时代的发展特点。

另外，与西汉早期一些诸侯王的妾或夫人墓葬如永城保安山 M3 内发现有金缕玉衣敛葬不同，西汉晚期诸侯王的妾或夫人墓葬内已无敛葬玉衣发现，说明这一时期可能已有她们不能用玉衣敛葬的制度。据《汉书·外戚传》载，王莽曾奏言曰“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宫，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请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媵妾之次”，被许可。藩妾即诸侯王之妾，王莽言珠玉之衣非她们的敛服，可见应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在西汉早期并不存在，至于什么时候形成的，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而从这一记载看，西汉中晚期使用玉衣敛葬的相应分级制度也已较为明确。

(五) 从时代上看，西汉诸侯王墓出土玉衣的总体形制变化不大，除早期所用玉片小而多，中晚期略大略少外，其他特征并不明显。这些玉衣或为御赐，或由诸侯国的官营作坊制作。制作一件玉衣所消耗的人力与物力巨大，而使用人群少，基本为等级身份较高者，形制无太大变化当在情理之中。另外，西汉诸侯王墓中，“出土的金缕玉衣似有以下规律：一般王墓的玉衣片形制小，用的玉片多，玉片的制作较为精细，玉质好，而王后墓虽也使用金缕玉衣，但一般玉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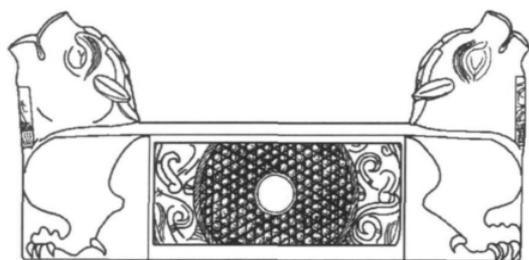
大，编缀玉衣所使用的玉片数量相对较少，制作略显粗糙，而且都发现有玉璧改制而成的玉片”<sup>④</sup>。这一差别既是使用上的差别，也是等级制度在玉衣制作上的体现。

### 三、西汉诸侯王墓中与玉衣相关的敛葬玉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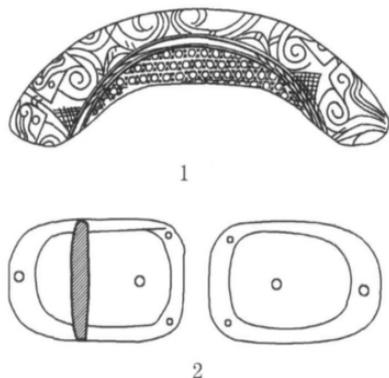
除玉衣外，西汉诸侯王墓还发现一些与之相配套的敛葬玉器如枕、握、琕、塞等，它们与玉衣一起构成了西汉诸侯王墓的玉敛葬体系。

#### (一) 枕

目前所知，西汉墓葬中有漆枕、镶玉枕及其他类别的枕等多种，等级高的墓葬中发现较多。西汉诸侯王墓中出土枕多为镶玉枕，另有其他一些种类，有玉衣者基本位于头罩之下，或因盗扰有所位移。徐州狮子山汉墓 W:77 为镶玉漆枕，所镶虎头由整玉透雕而成。满城 M1、M2 出土的为镶玉铜枕，M2:4003，枕内有花椒，枕身长方形，枕面及两侧、两端均镶玉，作透雕和阴线浮雕花纹。枕面镶嵌长方形玉饰 2 块，分别刻有涡纹和蒲纹；两侧嵌长方形玉饰各一块，上刻兽面蒲纹；两端各嵌一梯形玉饰，上刻涡纹。以上玉饰，中心皆有圆孔。枕端兽首的颈部、脑后和额



图五 河北满城 M2 出土镶玉铜枕



图六 河北满城 M1 出土的玉握及眼盖

1. 河北满城 M1 出土璜形握
2. 河北满城 M1 出土眼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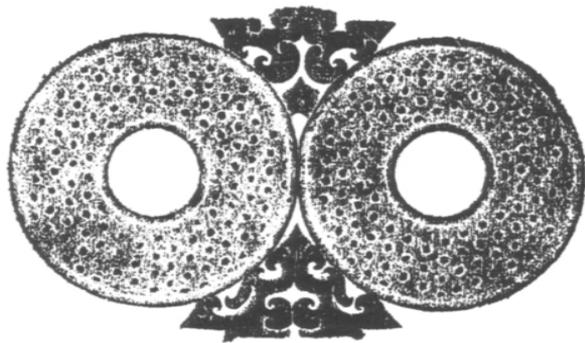
部也分别嵌有玉饰，形状分别为梯形、长方形和三角形（图五）。北京大葆台 M1 出土镶玉铜枕两端作虎头状，虎头的牙齿、额、眼睛等部位镶玉。另外，南越王墓的西耳室出土有石枕，长方形，表面光滑，为明器，而在墓主头下部无玉枕，推测可能为漆枕。对比看来，西汉同姓诸侯王墓内出土丧葬用枕较异姓诸侯王墓出土丧葬用枕的等级整体要高，镶玉与漆或石的质地差异可以体现，而这也与上文论述较为一致。

#### (二) 握、琕及塞等

握、琕及塞等敛葬品在西汉诸侯王及王后墓中常有发现，基本为玉制，少量为滑石或其他质地。它们多与玉衣配合使用，目的也是为了保护尸体，以使不朽。出土玉衣的西汉诸侯王墓的玉握多数位于玉衣的手套之内或旁侧。握大多呈趴卧豚状，整玉雕成，但也有一些玉握呈其他形状。河北定县 M40、满城 M1 出土的玉握整体形状呈弧形，由玉璧改制成璜形。（图六：1）满城 M2 的墓主左、右手均握璜形玉，但其左手还握有一件小铜镜。河南永城窖山 M2 出土的玉握更为简单，呈板形，两端同向较尖。琕及塞泛指填塞于死者眼、耳、鼻、嘴、前后阴等处的敛葬品。眼部多为眼盖，部分位于玉衣内，如满城 M1 出土玉眼盖，作圆角长方形（图六：2），而狮子山汉墓出土的玉眼盖实际就是玉衣的一部分，呈圆形。琕及塞均位于玉衣内部。西汉诸侯王墓出土玉琕形制较为多样，满城 M1 出土玉琕呈月牙形，定县 M40 出土玉琕为蝉形。塞的形体大多一端小，一端略大，满城 M1、M2 等均有出土。

#### (三) 其他

据《礼记·士丧礼》载“商祝掩瑱，设幌目，乃屨，綦结于跗。”指的是为死者裹头，用瑱为死者塞耳，用幌目将死者的脸覆盖起来，又为死者穿上屨，将缀在后跟的丝带在脚背上系好，并将丝带与屨头上的瑱连结起来<sup>⑤</sup>。这段记载所言固定双脚的器物也有所发现。广州南越王墓主棺室出土玉璧一件，编号为 D186。为两圆璧外切相连，连结处的上下方均透雕卷云纹饰，下方的卷云纹两边各雕一鸚鵡。出土时置于玉衣的双鞋下方，两孔之间都有丝带痕迹，通宽 12.3，高 7.4 厘米。（图七）该璧的通宽与一般人双脚并拢的宽度大体相当，结合出土位置、形状及玉璧孔内遗留的丝带痕迹。笔者认为，墓主



图七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固定双脚的连璧形器

脚下的这块双联玉璧应是用以固定双脚时系丝带以使之固定和达到装饰目的的敛具。而该墓墓主所着敛服为玉衣，因此该玉璧应是固定在玉脚套之下，从而成为玉衣的配套敛葬品之一。该类器物在西汉诸侯王墓中目前仅此一例，在一定程度上又体现了南越王墓的特殊性。

就目前来看，异姓诸侯王墓如石家庄小沿村张耳墓、长沙象鼻嘴 M1 等有玉璧等礼器发现，但基本无玉敛葬器出土。南越王具有特殊性，未遭盗掘的南越王墓中也仅有丝缕玉衣及少量敛葬玉器发现，与一般刘姓诸侯王墓无法相比。结合上文对玉衣相关问题的探讨，西汉时期关于异姓诸侯王死后使用敛葬玉器都应存在一定的限制或禁令。综合看来，西汉诸侯王墓使用玉敛葬器较完整的组合为玉衣 + 玉枕 + 玉塞 + 玉琰 + 玉握等，河北满城 M1、M2 等皆有出土。但这一组合在多数墓葬中并不完善，而是有所缺省，一些墓葬还有其他器类。定县 M40 内除玉枕外，其余皆有发现，而徐州东洞山 M2 等内仅有个别器类，南越王墓内则有固定双脚的璧形器，这些均说明西汉时期整体用玉敛葬的制度仍有诸多不完善之处。综合对照西汉诸侯王墓内的敛葬玉器，玉衣形体大，制作精良，可视为敛葬玉器的主体。其他敛葬玉器与玉衣配套使用，但种类或有或无，同类器物的形体不一，制作差别大，而且很多由他玉改制而成，因此它们应作为西汉诸侯王墓敛葬用玉的附属器物。由上来看，西汉诸侯王墓在使用敛葬用玉时有主次关系，即以玉衣为主，其他为辅，体现出一套相对较为完整的玉敛葬制度。

总的看来，西汉诸侯王墓大多使用玉衣及其他配套敛葬玉器，这是其身份地位的体现，也与其保护尸身，以求不朽和追求升仙等丧葬思想基

本一致。玉衣等的使用体现出发展特点和相应的制度，但也存在很多地域和时代特征，并有一些不完善之处和特殊性存在。

- ① 杨树达 《汉代婚丧礼俗考》（王子今导读），47～53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韩国河 《秦汉魏晋丧葬制度研究》，50～91 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 年。
- ② 卢兆荫 《试论两汉玉衣》，《考古》1981 年第 1 期；《再论两汉玉衣》，《文物》1989 年第 10 期；石荣传 《两汉诸侯王墓出土葬玉及葬玉制度研究》，《中原文物》2003 年第 5 期；《从两汉诸侯王墓出土玉器看汉玉艺术风格》，《文物春秋》2004 年第 1 期；罗波 《汉代玉衣与升仙思想初探》，《文物春秋》1994 年第 3 期等。
- ③ 《汉书·礼乐志》、《后汉书·礼仪志》及一些《纪》、《传》、《志》和《汉旧仪》等书中都有相关记载。其中如《汉旧仪》载“帝崩，含以珠，缠以纆纆十二重。以玉为襦，如铠状，连缝之，以黄金为缕。腰以下以玉为札，长一尺，[广]二寸半为柙，下至足，亦缝以黄金缕。请诸衣衾敛之。凡乘舆衣服，已御，辄藏之，崩皆以敛”《后汉书·皇后纪》载“敛以东园画梓寿器、玉匣、饭含之具”等。
-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 年。
- ⑤ 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等 《定县 40 号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文物》1976 年第 7 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河北定县 40 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 年第 8 期。
- ⑥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石家庄市文物研究所、鹿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鹿泉市北新城汉墓 M2 发掘简报》，《文物春秋》2008 年第 4 期。
- ⑦ 河南永城地区的梁王、王后及妾或夫人的墓葬资料均见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永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文物出版社，2001 年。
- ⑧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望城县文物管理局 《湖南望城风篷岭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7 年第 12 期。
- ⑨ 狮子山楚王陵考古队 《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发掘简报》，《文物》1998 年第 8 期；韦正、李虎仁、邹厚本 《江苏徐州市狮子山西汉墓的发掘与收获》，《考古》1998 年第 8 期。
- ⑩ 徐州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文物出版社，2003 年。
- ⑪⑭ 徐州博物馆 《徐州石桥汉墓清理报告》，《文物》

- 1984年第11期。
- ⑫⑬⑭①梁白泉 《高邮天山一号汉墓发掘侧记》，《文博通讯》1980年第32期；高炜 《汉代“黄肠题凑”墓》，《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443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 ⑬ 大葆台汉墓发掘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葆台汉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
- ⑭ 山东省博物馆 《曲阜九龙山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5期。
- ⑮ 安徽省六安市文物管理局胡援 《对六安双墩一号汉墓的几点认识》，《中国文物报》2007年7月27日第7版。
- ⑯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 《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 ⑰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山东大学考古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章丘市博物馆 《山东章丘市洛庄汉墓陪葬坑的清理》，《考古》2004年第8期。
- ⑱ 王守功、崔圣宽 《章丘市危山汉代陪葬坑》，217~218页，《中国考古学年鉴》，2003年。
- ⑲ 刘华国 《山东青州香山汉墓陪葬坑出土大批精美文物》，《中国文物报》2006年9月13日第2版。
- ⑳ 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 《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
- ㉑ 梁勇 《从西汉楚王墓的建筑结构看楚王墓的排列顺序》，《文物》2001年第10期。
- ㉒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沧州市文物管理处、献县文物管理所 《献县第36号汉墓发掘报告》，《河北省考古文集》，241~260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
- ㉓ 石家庄市图书馆文物考古小组 《河北石家庄市北郊西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1期。
- ㉔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鹿泉市文物保管所编著 《高庄汉墓》，科学出版社，2006年。
- ㉕ 王鑫、程利 《石景山老山汉墓》，104~105页，《中国考古学年鉴》，2001年。
- ㉖ 山东大学考古系、山东省文物局、长清县文化局：《山东长清县双乳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3期。
- ㉗ 潍坊市博物馆、昌乐县文管所 《山东昌乐县东圈汉墓》，《考古》1993年第6期。
- ㉘ 山东省菏泽地区汉墓发掘小组 《巨野红土山西汉墓》，《考古学报》1983年第4期。
- ㉙ 湖南省博物馆 《长沙象鼻嘴一号西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 ㉚ 长沙市文化局 《长沙咸家湖西汉曹嫫墓》，《文物》1979年第3期。
- ㉛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简牍博物馆 《湖南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4期。
- ㉜ 邱永生、徐旭 《徐州市驮篮山西汉墓》，173~174页，《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年。
- ㉝ 南京博物院、铜山县文化馆 《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徐州博物馆 《江苏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材料的再补充》，《考古》1997年第2期。
- ㉞ 周学鹰 《徐州汉墓建筑——中国汉代楚（彭城）国墓葬建筑考》，134~139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
- ㉟ 陆建芳、杭涛 《泗阳县大青墩汉墓》，176~177页，《中国考古学年鉴》，2003年。
- ㊱ 何旭红 《湖南望城风篷岭汉墓年代及墓主考》，《文物》2007年第12期。
- ㊲ 刘尊志 《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墓主再探》，《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 ㊳ 任相宏 《双乳山一号汉墓墓主考略》，《考古》1997年第3期。
- ㊴ 临沂地区文物组 《山东临沂西汉刘疵墓》，《考古》1980年第6期。
- ㊵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 《河北邢台南郊西汉墓》，《考古》1980年第5期。
- ㊶ 潍坊市博物馆、五莲县图书馆 《山东五莲张家仲菡汉墓》，《文物》1987年第9期。
- ㊷ 卢兆荫 《再论两汉玉衣》，《文物》1989年第10期。
- ㊸ 见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永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275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 ㊹ 杨天宇 《礼仪译注》，352~3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责任编辑: 武 玮)